Oct. 2020

2020年10月 HUNAN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

引用: 贾杨. 从五枚民国徽章窥中央国医馆分支机构点滴[J]. 湖南中医杂志, 2020, 36(10): 126-127, 153.

从五枚民国徽章窥中央国医馆分支机构点滴

贾 杨

(上海市中医文献馆,上海,200020)

[摘要] 通过"中央国医馆湖北省分馆""中央国医馆嘉兴县支馆""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""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新会县支馆""中央国医馆江津支馆中医学术研究会会员证章"五枚民国时期徽章的介绍,回顾中央国医馆在设置省市级分馆和县市级支馆方面有关制度、方法与规模。同时,建议在近代中医药传世实物研究中,进一步挖掘、整理中医药题材证书与徽章,发挥其在断代、定性方面的独特作用。

「关键词〕 中央国医馆;分支机构;徽章;中医药题材证书

「中图分类号]R2-09 「文献标识码]A DOI:10. 16808/j. cnki. issn1003-7705. 2020. 10. 055

近代中医史上,中央国医馆作为民国时期由政府举办的中医药机构,在发展中医学术、加强中医教育、规范中医执业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,特别是推动民国政府发布近代第一部全国性的中医药法规——《中医条例》^[1]。此外,中央国医馆在各地积极推进设立省市级分馆以及县市级支馆,以壮大队伍、扩大影响。我们在收藏民国时期中医药题材证书与徽章的过程中,保存了五枚与中央国医馆相关的徽章,藉此回顾中央国医馆分支机构设置的情况。

第一枚:"中央国医馆湖北省分馆"徽章(见图 1)。直径 2.6 cm,质地 方合金 珐琅。 其民政府的典型样式,作为省级计庄重。背面有"证 No95"等样,是该机构的批



图 1 中央国医馆湖北省分馆徽章

第二枚:"中央国医馆嘉兴县支馆"徽章(见图 2)。直径 3.0 cm, 质地为银质珐琅。正面字体阳刻, 湖绿色珐琅完好无损, 似一汪深潭, 意境深远。背面有"九州 20"字样, 说明是当地九州银号打制的, 佩戴者编号 20。这是一枚民国时期比较流行的挂链式徽章, 字体质朴, 艺术感强。

省分馆成立于1933年4月3日,范筱村、孔庚先后任馆长。

浙江省嘉兴县支馆成立于 1936 年 8 月 7 日, 陈骏八任馆长。



图 2 中央国医馆嘉兴县支馆徽章

第三枚:"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"徽章(见图 3)。直径 2.4 cm, 质地为合金烤漆。正面左右分列, 圈读"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",下方有"164"编号,中央是兰花图案,寓意典雅高洁、忠贞爱国。背面有"馆员证广州光复北大成制"字样。光复路现属广州市荔湾区,于1931年改建成现代马路,以"光复"为名,以纪念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,光复中华河山;"北大成"则是徽章作坊商号。广东省分馆成立于1931年10月,邹殿邦、邹尧常、霍芝庭、潘茂林、王金石先后任馆长。该馆曾在1932年12月10日组织召开全省医药

代表大会,议决涵 盖制订中医师与中 药师考试条例、等 办国医学校等;于 1933 年组织广东 省国医分馆救护总 队;并在 1936 年成 立了医药改进会 分会^[2]。

第四枚:"中 央国医馆广东省 分馆新会县支馆"



图 3 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徽章

徽章(见图 4)。这枚章与上述广东省分馆章同出一辙,也是直径 2.4 cm,合金烤漆质地。正面圈读"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新会县支馆",下方有编号"70",中央区域同样有一株兰花。烤漆尚有残存,蓝字、红花。背面有"馆员证 光复北大成制"字样,与省分馆章是同一家作坊出品。此章的独特之处是挂链上有一个圆形的"国"字扣,这也是民国时期徽章的一种式样,往往为了突出主章的核心内容。一个"国"字,凸显了"国医"。新会是出产正宗"广陈皮"的地方,现为江门市新会区,中医药底蕴深厚。新会县支馆成立于 1932年 7月 16 日,馆长为黄焯南。该馆曾向社会募捐开设了治疗所,开展赠医施药,并附设救护队,还组织了医药研究委员会进行学术整理;同时,积极参与地方中医药行政管理工作,取得了一定成效。章上"70"字样,说明当年新会县为国医馆服务的人至少有七十,规模不算小^[2]。



图 4 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新会县支馆徽章

第五枚:"中央国医馆江津支馆中医学术研究会会员证章"(见图 5)。直径 3.1 cm,质地为合金珐琅。正面蓝底白字,



图 5 中央国医馆江津支馆中医学术研究会会员证章

各种中医药社团登记如雨后春笋一般,最多时逾千,纷纷开展学术整理工作,为彼时困境中的中医药发展保留了星星之火^[3]。

在经历了1929年3月的"废止中医案"斗争之后,中医药界就普遍产生一个共识,那就是中医药要得以生存发展,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组织合法性和行政领导地位,需要建立一个被民国政府承认并合法授权的专门机构,在政治、学术、执业等层面统一进行领导,以团结各方面的力量。1930年1月,裘吉生、蒋文芳等中医名家共同提议,设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医药学术综合机构——中央国医馆,该馆的主要职能就是"改进国医、研究医药、管理国医药事物"。同年9月召开筹备会议,中医药界推举陈郁、焦易堂、施今墨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,陈郁为会务主任。1931年3月17日,中央国医馆在江苏南京举行成立大会,选举陈立夫为首届理事长,彭养光、陆渊雷、谢利恒等十人为首届常务理事,焦易堂为馆长,陈郁、施今墨为副馆长^[4]。

1931年8月31日,国民政府核准通过了《中央国医馆各省市国医分馆组织大纲》,各省市积极响应,纷纷成立分馆。至1935年,经中央国医馆机关刊物《国医公报》刊载确认的国医分馆已达22个,占当时全国28个省份的62.3%;甚至在美国旧金山、泰国、菲律宾以及中国香港、澳门等地也组建了分馆。《中央国医馆各省市国医分馆组织大纲》规定,各分馆制订的章程、组织架构以及工作计划等必须上报中央国医馆批准;分馆馆长由中央国医馆指派;董事会人选须向中央国医馆报备;开办经费则向所在地政府寻求资助,如有不足,再由董事会进行社会募集。1937年后中央国医馆又出台了《中央国医馆各省市分馆组织补充办法》,进一步解释了学术团体的组织内涵、扩大了分馆馆长人选的范围,同时,将分馆的内设机构定为事务、医务、药务三科。这二个规定的出台,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各分馆的筹办与运作[5]。

在各省市分馆相继成立的同时,全国很多各县市也提出了建立国医支馆的要求。但由于当时 (下转第153页)

- [4] 彭清华, 忻耀杰. 中医五官科学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 社.2015.
- [5] 张伯礼, 薛博瑜. 中医内科学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 社.2012.
- [6] 马融,韩新民. 中医儿科学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2.
- [7] 马宝璋,齐聪. 中医妇科学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,2012.
- [8] 陈红风. 中医外科学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2.
- [9] 曾世荣.活幼心书[M].田代华,林爱民,等,点校.天津: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9:33.
- [10] 顾世澄. 疡医大全[M]. 叶川,夏之秋,校注. 北京: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,1994:628.
- [11] 徐春甫. 古今医统大全:下册[M]. 崔仲平,王耀廷,主校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1:879.
- [12] 黄承昊. 折肱漫录[M]. 邢玉瑞,乔文彪,校注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.2016·231-232.
- [13] 孙思邈.备急千金要方[M].林亿,校正.刘更生,张瑞贤, 点校.北京;华夏出版社,1993;384,389.
- [14] 徐文弼. 寿世传真[M]. 吴立鹏,点校. 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 社,1986;4.
- [15] 皇甫谧. 针灸甲乙经[M]. 黄龙祥,整理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.2006·23.
- [16] 马莳.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[M].孙国中,方向红,点校. 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7:415.
- [17] 吴谦. 医宗金鉴·四诊心法要诀注释[M]. 吴忠祥,王永宏,

(上接第127页)中央国医馆未考虑在县市一级设立支馆,所以没有制度上的安排,故而四川、福建、江西等省提出在当地县市设立支馆的请求也未被中央国医馆核准。由于各地呼声日增,1932年11月6日,中央国医馆第十二次理事会专门讨论通过了《各县市设立国医支馆暂行办法》,规定国医支馆只能在重要县市设立,且必须在各省国医分馆成立之后才能提出设立申请。该办法出台后,由于要求严格,初期设立的县市支馆数量尚少,且集中在广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省,后期逐步增多。浙江在建成嘉兴、永嘉、平湖等国医支馆后,于1936年起又陆续筹建东阳、兰溪、奉化、仙居、象山等49个支馆;而甘肃则在1936年决定于十二个重要县设立支馆[5]。
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,中央国医馆随政府迁至重庆。在整个抗战期间,主要工作从学术研究转为以中医药支持抗战、服务军民为主,特别是开展了中药工业产业化,为最终赢得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。1946年,中央国医馆迁回南京。此后两年,由于政局动荡,工作处于停顿状态,至国民党迁往台湾后,中央国医馆就此解散,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^[6]。

在中央国医馆存续的八年时间内,各地分馆、支馆努力团结中医药同仁、全力提升中医药地位、积极发展中医药事

- 校注.长沙: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8:12.
- [18] 李中梓. 诊家正眼[M]. 包来发,整理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9:402.
- [19] 张介宾. 类经[M]. 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2016:169.
- [20] 冯兆张. 冯氏锦囊秘录[M]. 王新华,点校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8:93.
- [21] 董宿.中华医典·奇效良方[M].长沙:湖南电子音像出版 社.1998.
- [22] 林之翰. 四诊抉微[M]. 王宏利,校注. 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 出版社,2011;48.
- [23] 张洁,选集.仁术便览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85;56.
- [24] 鲍相璈. 验方新编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0:255.
- [25] 高思敬. 中华医典·外科医镜[M]. 长沙: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,1998.
- [26] 李时珍.本草纲目[M].王育杰,整理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 社,2004,674.
- [27] 虚白人. 救生集[M]. 王力,秋晨,由昆,等,点校. 北京:中 医古籍出版社,1993;176-177.
- [28] 王梦兰,纂集. 秘方集验[M]. 王玉英,王作林,点校. 北京: 中医古籍出版社,1990:117.
- [29] 张镜.刺疗捷法[M].孙敬青,李岩,点校.北京: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4.
- [30] 杨继洲. 针灸大成[M]. 黄龙祥,整理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 社,2006:430. (收稿日期:2019-11-09)

业,在近代中医药史上留下了浓重笔墨。本文展示的五枚徽章,正是从不同角度,再现了那一段历史,值得今世回味。同时,我们认为:长期以来,在近代中医药传世实物研究中,证书与徽章的价值尚未得到有效重视。相对于其他中医药文物而言,证书与徽章所展示的信息更加集中、更加精炼,可以较为准确地记录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或事件,甚至可以起到断代、定性的作用,值得进一步挖掘、整理和研究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于丁坤.中央国医馆与近代中医教育[J].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:教育科学版,2018,20(3):3-4,19.
- [2] 郑洪.民国广东国医分馆及各县支馆概况[J].中华医史杂志,2010,40(3):165-170.
- [3] 刘鹏.中央国医馆及其整理的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的历史回顾与评价[J].中医杂志,2019,60(20):1794-1797.
- [4] 李剑.中央国医馆的成立及其历史作用[J].广州中医学院学报,1992(2):116-120.
- [5] 姚璐.中央国医馆之综合研究[D].南京:南京中医药大学,2017.
- [6] 郑洪. 抗战时期的中央国医馆[J]. 中医药文化,2015,10 (6):25-29.

(收稿日期:2020-04-01)